



■盛松成 蒋一乐

### 统筹推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核心工具。统筹推动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精准施策,有助于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 总量层面

“十五五”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多目标、多约束的复杂格局,在本质上是由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解的系统工程。

先看“量”的方面:为平稳投放流动性,央行既需平滑短期波动,也需强化中长期支持。目前,国债约68%、地方政府债约75%由商业银行购买。商业银行作为核心持有主体,其可支配的中长期流动性水平直接影响配债意愿与配置能力。

作为中长期流动性投放的重要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以及买断式逆回购可为商业银行提供稳定的中长期资金来源,提高其配置政府债券的能力。这种以“量”为核心的协同方式,构成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特色。

#### 再看“价”的方面:

在政策利率调整方面,央行通过下调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即通常所称的降息),可引导国债收益率下行。这有助于降低政府融资成本,减轻财政利息负担,从价格层面支持财政扩张。

在低利率环境下,消费与投资对利率变化的弹性相对有限,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面临压力。相较之下,降准在补充中长期流动性、支持债券发行与交易、缓解银行经营压力等方面的综合效果相对更好。“十五五”时期,其适配性应优于降息工具。

#### 结构维度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过工具创新与机制配合,在政策对象、实施时点与节奏安排上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与匹配度。

先看政策方向的一致性:在科技创新领域,央行推出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以优惠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引导其加大对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领域的信贷支持;财政部同步推出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提振消费领域,央行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重点领域信贷支持;财政政策通过“双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以及发放育儿补贴、消费券和推进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举措,直接改善居民与企业现金流状况。

在支持经济薄弱环节方面,央行通过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向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倾斜;地方财政通过小微企业信贷奖励、政策性融资担保等措施形成配合。

#### 再看创新工具的互补性:

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如各类再贷款),本质上是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优惠利率贷款,是一种以债权形式向金融体系“让利”的安排,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向特定领域。这类工具主要用于实体经济中的薄弱环节,通常具有明确期限与回收要求,强调本金安全与风险管控,侧重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短期现金流状况,但难以承担长期资本投入和化解风险功能。

相较之下,财政政策工具更多体现为“股权”属性。通过财政注资补充实体经济或金融机构资本金,形成长期资本沉淀。例如,通过特别国债注资商业银行,缓解资本充足率约束,增强其信贷投放能力;通过财政资金支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或通过发行专项债为重大项目提供资本金,保障重大战略落地。这类资金不以短期回报为目标,能够直接承担风险和损失,更契合长期结构调整需求。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通过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如降准)以及政策利率调整,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保障政府债券顺利发行、稳定融资成本,进而扩大总需求。二者通过新型工具,聚焦科技创新、提振消费以及经济薄弱环节等领域,依托“债权+股权”工具互补机制,精准推进调结构、促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博士后)

■马明冲

## 将“学查改”贯通起来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学习,着力纠治“四风”突出问题,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端正政绩观导向、夯实从政根基……党内集中教育构建层层展开、有机衔接的理论武装体系,形成“理论领航定向、靶向破解难题”的鲜明格局,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需求同频共振。

坚持继承传统与创新形式相统一。一方面,用好专题研讨、集中宣讲、党课辅导、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等方式,在交流碰撞中深化理论理解、强化党性锤炼。另一方面,创新学习载体,推动集中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补充,拓展学习覆盖面,增强学习吸引力,实现常态化开展、多元化供给、精准化落实。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正中提质,推动理论学习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贯穿始终的基础工程。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始终坚持以“学”为先,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在深学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增强行动自觉,为集中教育走深走实筑牢思想根基。

坚持理论引领与靶向聚焦相统一。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为民务实清廉”,深入开展

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以“查”寻源,在真查、严查、细查中扶正纠偏——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查摆问题可谓党内集中教育的一个出发点。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始终把“查”作为关键环节,在查得准、查得实、查得深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勇于自我革命。

坚持对照标准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党内集中教育的“查”,坚持明确对照标准,坚守实事求是原则,既不降低标准、敷衍塞责,也不脱离实际、凭空捏造,让问题查摆有方向、有依据、有成效。特别是,注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群众期盼等查摆问题,防止“避重就轻、泛泛而谈”。

坚持自我检视与开门纳谏相统一。党内集中教育坚持“向内自省”与“向外征求”有机结合,构建“自己找、上级点、相互提、群众评”的立体化问题查摆体系。通过自我检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开门纳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广开言路听意见,畅通渠道纳良言。

坚持查摆问题与深挖根源相统一。在全面查摆问题的基础上,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根源、制度根源、作风根源深刻剖析,厘清问题成因、找准治本之策,弄清楚“问题为何发生、如何从根上解决”。通过坚持“查病灶”与“挖病根”有机统一,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认清问题本质、找准症结所在,为后续整改落实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奠定坚实基础,确保整改对症下药、务实求效。

以“改”促行,在真改、立改、长改中提质增效——

整改落实是党内集中教育的落脚点,是检验教育成效的“试金石”。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始终将“改”贯穿于全过程,坚持立行立改、真改实改、长效常改,注重标本兼治、见底见效。

坚持立行立改与久久为功相统一。党内集中教育秉持“急难问题立即改、长期问题持续改”,既不拖延敷衍,也不急于求成,推动即时见效与常态长效深度融合。对群众反映强烈、能够立即解决的突出问题,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逐项明确措施、压实责任、限期办结,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对需要持续改的深层次问题,坚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推进常态化整改、制度化落实,不断巩固拓展整改成果。

坚持靶向整改与全面整治相统一。党内集中教育注重精准施策、系统推进,既聚焦重点问题靶向发力,

又统筹全域问题综合治理,坚决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方面,紧盯查摆出的重点难点问题,组建专项整治专班,纵深推进专项整治,推动问题找到源头治理、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坚持全域覆盖、全面整治,对各类问题系统梳理、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做到不忽视一个细节、不漏掉一个短板。

坚持当下整改与长效常治相统一。党内集中教育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既紧盯当下突出问题狠抓整改落实,又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当下整改上,聚焦查摆出的各类问题,狠抓落实、一抓到底。长效常治上,深入总结整改实践中成熟的经验与有效举措,强化制度供给、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整改持续深化走向“常态长效”。

新征程上,要坚持“学”筑基、以“查”寻源、以“改”促行的方法指导,持续巩固深化党内集中教育成果,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作者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扫二维码  
看解放日报理论  
公号“解放 | 思想”  
更多文章

## 完善人民城市建设评价体系

多层次、差异化的指标框架。一是突出为民导向,强化民生指标权重,将居民收入增长、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更新覆盖率、“一老一小”服务设施配套率、群众满意度等作为核心指标。二是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增加创新投入占比、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产业升级质量、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等动能指标。三是突出系统导向,完善生态环保、安全韧性、文化传承等短板指标,破解重经济、轻生态,重建设、轻安全的失衡问题。四是突出差异化导向,对超大特大城市侧重核心功能提升和非核心功能疏解指标,对中小城市侧重城乡融合和特色产业培育指标,对资源型城市侧重转型发展指标。

优化评价实施机制,破解“怎么评价”的公正问题。一是健全多元评价主体机制,构建上级评价、群众评价、专业评价、第三方评价相结合的多维评价体系,包括扩大群众参与度,让群众成为政绩评价的重要参与者与监督者,并引入专业机构,对城市发展质量、治理效能、生态效益等进行科学评估。二是完善全过程评价机制,完善日常

监测、季度调度、年度考核、长期跟踪的全流程评价体系。三是规范评价流程,严控考核事项冗余,合并精简考核事项,避免多头考核、重复考核,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二是建立问题整改闭环机制,针对评价发现的短板弱项,督促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细化整改举措,并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推动评价成果转化为城市发展实效。三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区分在干事创业中出现的失误与不作为、乱作为。

校准干事方向、提升干事能力、强化干事担当——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脚点在于激励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复杂性工程,涉及规划、建设、治理、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完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评价体系,本质上是引导党员干部校准干事方向、提升干事能力、强化干事担当。

以评价体系引领提升专业能力,筑牢担当作为的基础。现代化人民城

市建设对干部的专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既需要懂经济、善规划,也需要懂治理、善服务;既需要熟悉新型城镇化规律,也需要掌握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技能。一要强化精准培训,围绕现代化城市体系优化、新质生产力培育、城市更新、智慧治理、生态环保等重点任务开展针对性培训,提升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能力。二要注重实践锻炼,选派到城市治理一线、重大项目现场、基层服务岗位历练,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本领,培养一批懂城市、爱城市、兴城市的专业型干部。三要鼓励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以评价体系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凝聚担当作为的合力。正确的用人导向是激励担当作为的有效手段,科学的评价体系是选人用人的重要依据。一是突出实干导向,重点考察实干实绩,看是否直面问题、破解难题,是否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是否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让那些默默奉献、深耕细作的“老黄牛”得到认可和重用。二是鼓励创新突破,对在城市发展中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且取得突破性成效

的,在评价中予以倾斜,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城市发展理念、模式、手段的系统创新。三是强化正向激励,除了提拔重用,还可对实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宣传,凝聚起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强大合力。

以评价体系强化纪律约束,坚守担当作为的底线。激励担当作为,既要靠正向激励,也要靠反向约束,引导党员干部敢干事、能干事、又不出事、不干事。一是强化生态环保约束,将生态环境质量、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等指标作为“一票否决”项,引导坚守生态底线,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二是强化安全责任约束,将城市安全、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建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指标纳入评价,督促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三是强化作风建设约束,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纳入评价,对那些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问责。

(作者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严运楼

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制度支撑,是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指挥棒。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六大目标,构成政绩评价的核心维度:宜新城市对应动能转换的政绩,宜居城市对应民生改善的政绩,美丽城市对应绿色转型的政绩,韧性城市对应安全保障的政绩,文明城市对应文脉赓续的政绩,智慧城市对应治理增效的政绩。完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评价体系,有助于引导党员干部校准政绩观,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评价导向、政绩导向、发展导向高度统一——

完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评价体系,关键在于破解“评价什么、怎么评价、评价结果怎么用”的核心问题,实现评价导向、政绩导向、发展导向高度统一。

精准设定评价指标,破解“评价什么”的导向问题。指标体系是评价体系的核心,必须紧扣现代化人民城市六大目标,兼顾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编排层与应用层构成。推理层基于大语言模型实现目标理解与决策规划,编排层负责多步骤任务的执行顺序与资源调度,应用层通过工具调用、API连接等方式与外部环境交互。这一架构使人工智能具备时间连续性、跨系统行动能力和多智能体协作潜力。

从经济属性看,人工智能体兴起意味着市场参与主体的拓展。当决策与执行环节可由智能体代理完成,交易成本结构、信息不对称程度乃至市

场均衡特征都将发生变化。据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促成超过8万亿美元在线交易,人工智能搜索的流量份额将达到65%。这揭示了人工智能重塑商业生态的潜在规模,也解释了为何主要经济体纷纷将其置于战略优先位置。

往更深层看,智能经济蕴含市场权力结构的深刻变革。在互联网时代,平台掌握流量入口,通过竞价排名、算法推荐等方式引导用户决策,用户名义上的自由选择实质受制于平台规则。人工智能体的出现,有望

打破这一格局。它通过帮助用户比价、识别营销套路、过滤冗余信息等,使决策主导权重新回到用户手中。这种权力转移将带来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的B2C(企业—消费者)模式有望向B2A2C(商家—人工智能体—消费者)模式演进。

由此,商家营销的重心从刺激冲动消费转向证明品质价值,产品信息需以结构化的、可比较的方式呈现,以适应人工智能体的理性决策逻辑。随着消费者转向智能代理驱动的购物

体验,依赖广告收入的零售媒体网络可能遭遇冲击。企业需使其收入来源多样化,探索基于数据洞察、高级订阅、交易分成的创新变现方式。

当然,智能经济的健康发展仍面临多重理论难题与实践瓶颈。技术层面,幻觉问题与推理能力瓶颈制约着人工智能体的可靠性。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文本预测器”,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推理机”,在需要精确事实和复杂策略的场景中可能产生错误输出。如何确保人工智能体的选择真实反映用户的深层偏好,避免

优化代理指标而牺牲用户体验,这是委托代理问题的智能时代版本。

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顶尖模型在评估预期效用和解决博弈问题的经济推理测试中表现有限,其偏好的稳定性、信念的校准度、目标的可知性都存在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均衡的诸多结论不能简单移植到包含人工智能体的经济系统中。

经济层面,所有权成本与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部署意愿。人工

智能体的相关消耗量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倍,运营成本的可预测性较低,部分项目可能因成本上升或商业价值不明确而被搁置。

治理层面,责任归属困境尤为突出。当人工智能体基于自主决策造成损失,责任应由开发者、部署者还是用户承担?现行法律对行为主体的界定面临一些挑战。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智能体的跨系统行动能力意味着单一漏洞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传统安全措施假设攻击目标是单一系统,而在智能经济中,攻击者可能通过操纵一个智能体的

行为波及整个智能体网络。

面向未来,智能经济的健康发展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建设的协同推进,必须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技术演进方向呈现两种可能路径:一是“围墙花园”模式。大型平台依托用户基础构建封闭的人工智能体交互生态,通过规则设定和质量筛选保障安全。二是“开放网络”模式。基于标准化协议实现不同人工智能体之间的自由通信,市场权力分散化,但需要解决身份验证、信任建立等集体行动问题。两种路径的竞争与融合将决定未来市场结构,其背后是平台经济时代“守门人”逻辑与互联网原生“去中心化”理想之间的深层张力。

制度建设层面,有必要着力构建与智能经济相适应的治理框架:一是完善责任归属规则,明确人工智能体行为的法律后果承担机制,可探索人工智能体行为记录与审计制度,为责任认定提供依据;二是建立评估认证体系,发展第三方评估机构,持续监测人工智能体的安全表现、任务成功率与用户满意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三是强化多智能体协调机制,借鉴机制设计理论,预防智能体共谋、协调失灵等潜在问题,保障市场有序运行;四是加强人才培养,要培养一大批复合型、创新型、实战型数字人才,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科技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

## 发展壮大智能体产业